

“两个结合”视域下：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贯通性分析

肖蒲恒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西安，710105；

摘要：在“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深刻的历史连续性与理论创新性。本文通过分析两大理论体系在实践逻辑、价值取向与文化基因三个维度的贯通性，揭示其共同遵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阐明“两个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奠基作用与时代升华意义。研究认为，两大思想体系既保持了理论内核的一致性，又通过历史条件的变迁实现了实践形态的跃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两个结合；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DOI：10.64216/3104-9672.25.02.037

1 理论谱系的双重飞跃与“两个结合”的内在关联

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历程中，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开启了第三次飞跃的新阶段。两次飞跃均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前者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求，后者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化与文化自信提升。从历史维度看，毛泽东思想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突破，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应用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回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种理论谱系的延续性，本质上源于“两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的深度融合。

“两个结合”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进一步提出“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两大思想体系虽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本文将从实践逻辑、价值取向、文化基因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两大思想体系的理论贯通性。

2 实践逻辑的贯通：从革命到复兴的路径探索

2.1 毛泽东思想：革命实践与制度奠基

毛泽东思想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实际为出发点，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革命道路选择上，毛泽东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束缚，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这一战略既符合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也吸收了传统“农村自治”文化中的群众动员智慧。例如，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既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也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这一文献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试图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尽管受历史条件限制，部分政策未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但其核心逻辑——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整生产关系——为后续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反思的起点。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虽存在平均主义倾向，但也体现了对集体经济形式的探索，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现代化实践与治理升级

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践。

在脱贫攻坚战中，“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具有典型意义。这一方略通过建立贫困人口数据库、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等），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微观行动。其背后既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中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也通过大数据技术、网格化管理等现代手段实现了治理能力的跃升。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另一重要实践创新。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提出“乡村振兴计划”，通过产业扶持、人才引进、生态保护等措施推动农村现代化。例如，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转化为制度设计，通过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既延续了毛泽东“均富”思想的内核，又通过数字赋能、绿色经济等新手段实现了发展方式的升级。这种实践创新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保持了理论连续性，又通过历史条件的变迁实现了实践形态的跃升。

3 价值取向的贯通：人民立场与共同富裕的追求

3.1 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与人民主体性

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确立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价值取向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土地革命中，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农民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目标。例如，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试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尽管受计划经济体制限制，部分政策未能完全实现预期效果，但其核心逻辑——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为后续改革奠定了价值基础。

毛泽东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还体现在政治参与层面。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1954年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均试图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些实践既吸收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现了政治主体的转换。例如，延安时期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广泛民主，为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历史参照。

3.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享发展与社会公平

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习近平提出“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计划等

缩小城乡差距。例如，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山海协作”工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对帮扶），推动产业梯度转移，既延续了毛泽东“均富”思想的内核，又通过市场机制、数字技术等新手段实现了发展效率的提升。在收入分配领域，三次分配理论的提出具有创新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第三次分配（慈善、志愿活动等）通过道德力量补充制度调节，形成了多层次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基层治理创新是价值取向贯通的另一体现。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实现了传统“乡贤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机结合。例如，浙江诸暨市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平台，将儒家“礼治”传统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规则，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增强了群众参与感。这种治理模式既继承了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又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提升了治理效能。

4 文化基因的贯通：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融合

4.1 毛泽东思想：传统文化批判与革命文化建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既批判封建礼教，又吸收“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传统智慧。在军队建设中，毛泽东强调“官兵一致”，将《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转化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例如，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通过思想建军、政治建军打破了旧式军队的等级制度，体现了对传统“兵法文化”的现代转化。

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更具典型性。通过“整风运动”实现思想统一，毛泽东将儒家“修身齐家”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要求。《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既是对传统考据学的批判性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表达。在文艺领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将传统“文以载道”思想转化为革命文化的创作导向，推动了大众文艺的繁荣。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自信与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传统智慧，将中国发展经验上升为全球治理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融合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文化解释框架。在基层治理中，“枫

桥经验”通过“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实现了传统“乡贤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机结合，彰显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能力。

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更具创新性。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文物活化利用，将传统“工匠精神”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抖音等平台通过短视频传播非遗文化，使传统艺术形式获得新生。这些实践既延续了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文化方针，又通过技术赋能扩大了文化影响力。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将传统美德（如诚信、友善）与现代公民素养相结合，构建了新时代的精神文明体系。

5 理论创新的规律性：从“破立”到“守正创新”

5.1 毛泽东思想的突破性：革命理论的本土化

毛泽东通过《实践论》《矛盾论》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将“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束缚。例如，1956年八大决议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试图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为改革开放预留了理论空间。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升华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新时代以“文化自信”为根基，习近平提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解释框架。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既继承了毛泽东“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又通过数字民主、协商民主等新形式实现了制度创新；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结合”的原则，延续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平衡思维，又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提升了治理效能。

这种理论升华体现了“两个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拓展。在对外关系中，“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传统“和合文化”转化为国际合作理念，既区别于西方零和博弈思维，也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合作框架。在党内治理中，“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八项规定”“反四风”等举措，将传统“修身律己”要求转化为制度约束，实现了党的建设现代化。

6 结论：理论贯通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的理论贯通性，本质上是“两个结合”方法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成果。前者以革命实践破除旧制度枷锁，后者以文化自信构建新发展格局；前者奠定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后者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种贯通性不仅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为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历史维度看，两大思想体系的延续性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以实现人民幸福为落脚点。从现实维度看，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深化实践，既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例如，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既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主义方法），也可以借鉴传统“孝道文化”构建家庭养老支持体系（传统文化方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正是“两个结合”生命力所在。

面向未来，需在“两个结合”框架下持续深化理论创新。一方面，要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等历史经验的研究，总结其方法论启示；另一方面，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将其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既具有历史纵深感，又彰显时代生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李明. “两个结合”视域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3): 15-20.
- [2] 王华, 张丽. 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逻辑上的契合[J]. 理论探讨, 2023(1): 33-38.
- [3] 赵强. 从毛泽东思想到新时代思想：“两个结合”中的价值取向传承[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12): 45-50.
- [4] 陈刚. 浅析“两个结合”下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思想的文化基因贯通[J]. 文化学刊, 2023(2): 8-12.
- [5] 刘悦. 理论创新规律：“两个结合”中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思想的演进[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10): 67-72.

作者简介：肖蒲恒（2004.07——），籍贯：云南省昆明市，汉族，男，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从“两个结合”看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思想的传承发展。